

郭沫若研究 新论

卜庆华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郭沫若研究新论

卜庆华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 208 号

DK 16/5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郭沫若研究新论/卜庆华著, -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11

ISBN 7-81039-579-3

I. 郭… II. 卜… III. 郭沫若-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9291 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国马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字数 213 千 印数 0 001-2 000 册

定价 16.00 元

目 录

总 论..... (1)

- 论郭沫若早期的哲学思想..... (1)
- 郭沫若与斯宾诺莎 (16)
- 论郭沫若早期的“唯能论”思想 (28)
- 郭沫若研究 30 年述评(上) (34)
- 郭沫若研究 30 年述评(下) (48)

文学编 (64)

-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诗剧 (64)
- 《女神》“没有直接表现反帝内容的作品”吗 (67)
- 《女神之再生》与有岛武郎的剧作 (70)
- 科学诗与时代精神 (73)
- 《凤凰涅槃》的哲学意蕴 (80)
- 关于《星空》集 (84)
- 论《孤竹君之二子》的“返于自然”说 (88)
- 郭沫若早期与外国文学关系考源 (95)
- 关于《红痣·序》和《野火集·序》..... (115)
- 《郭沫若的史剧艺术》序..... (118)
- 毛泽东、郭沫若修改《登庐山》诗稿始末 (123)
- 郭沫若、田汉互改《贺圣朝》的得与失 (125)

郭沫若巧改时文.....	(128)
--------------	-------

史学编..... (131)

“夏社”史实述略.....	(131)
郭沫若参加北伐战争史实订补.....	(136)
郭沫若南昌起义回忆录史实订补.....	(144)
郭沫若史实发微.....	(150)
殷纣王自经说辨疑.....	(168)
论郭沫若对秦始皇评价的转变.....	(171)
《甲申三百年祭》出版的前前后后.....	(176)
关于郭沫若致田中庆太郎的书简.....	(183)
田中庆太郎与中日文化的交往.....	(187)
要善于“从无字缝中读书”.....	(196)

考据编..... (200)

郭沫若研究若干问题考辨之一.....	(200)
郭沫若研究若干问题考辨之二.....	(209)
郭沫若研究若干问题考辨之三.....	(223)
郭沫若研究若干问题考辨之四.....	(235)
郭沫若研究若干问题考辨之五.....	(242)
郭沫若研究若干问题考辨之六.....	(250)
郭沫若著作考订二则.....	(255)
郭沫若诗集出版始末.....	(260)
《郭沫若年谱简编》订正.....	(265)
对五家郭沫若旧体诗词注释的再质疑.....	(269)

郭沫若旧体诗词注释订正·····	(282)
“新诗好续浙江潮”诠释·····	(287)
《郭沫若全集》注释疏误谈·····	(290)
为“黑辛”进一新解·····	(295)
新发现的郭沫若化名考释·····	(299)
郭沫若的“和”“同”观·····	(305)
郭沫若与湖南师范学院几位教授的翰墨因缘·····	(307)

附 录····· (316)

谈《郭沫若评传》的三次修改·····	(316)
我与郭沫若研究·····	(321)
后 记·····	(327)

● 总 论

论郭沫若早期的哲学思想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思想文化界的一位伟大的先驱者。关于他的思想发展的历程,学术界已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论文。但令人感到十分不足的是:对 1924 年以前郭沫若的思想研究显得比较薄弱。虽然有些研究者从他的政治态度、文艺思想和所受泛神论影响等问题,作过一些有益的探讨,但是,这种研究还欠全面和系统。特别是未能从哲学上,即对整个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总看法和根本观点上,揭示其认识发展的特点。例如对哲学上最普遍、最一般的问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世界是不是变化发展的?是怎样变化发展的?人的思想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怎样?等等,研究者很少从郭沫若当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作出科学的结论。这样,郭沫若早期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显得有些模糊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恐怕一是由于郭沫若在五卅前后主要是以诗人、剧作家和文学社团的创建者的身份出现的,人们不太注意他的哲学思想;二是由于郭沫若早期受各种思想影响,对其哲学思想,人们一时难以作出科学的理论的说明。为了从哲学的高度,科学地揭示郭沫若早期的思想理论体系,笔者试就郭沫若早期的哲学思想作些探讨。

作为一种世界观,它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形成的。人们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起初得到的知识和经验是

零碎的、具体的，以后经过不断的积累、概括和总结，形成对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对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即世界观。

郭沫若早期的世界观也是在不断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20岁以前，他在故乡四川度过了10来年不平凡的“学生时代”的生活。民族危机的深重，清王朝的腐败，西学的东渐，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开展，促使他对许多社会问题加以思考和认识。在爱国热潮的激荡下，他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运动。1913年底，又怀着对现实的深深不满，“奋飞”至海外留学。应当看到：郭沫若在出国前至留学日本的一段时间内，随着生活范围的扩大，他的某些看法已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如认为清廷必须推翻；中国在列强瓜分的危局中必须自立；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侵略已成为我们民族最大的危险等。但是，这些看法总的来说，还是自发的、朴素的，还未形成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

郭沫若早期的世界观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形成的。这是他不断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加以总结和概括的结果。早在1912年，他就阅读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著作，并对它产生了嗜好。“物竞天择”的进化理论，使郭沫若受到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的教育，同时也激发起他“自强保种”的爱国热忱。在日本习医期间，他学习过当时较为先进的“严整一套”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病理学等，还解剖过8具尸体。这种揭示自然界本身固有规律的自然科学及以客观态度从事的科学实验，使他不自觉地受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习染，培养了他的辩证思维的能力。特别是他接触到从19世纪末开始的人类对自然界由宏观到微观的科学认识，如被称为19世纪三大发现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进化论，以及以后的原子结构学说及量子力学等，对他认

识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运动的永恒性、绝对性,很有帮助。再从他对社会知识的学习和总结来说,在五四运动前后,郭沫若已广泛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卢梭的关于不平等起源的思想和“社会契约”说,康德的“善良意志”说,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等,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使他产生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郭沫若正是在上述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基础上加以概括和总结,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的世界观的。

一 自然观

在五四期间,郭沫若已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地球,我的母亲》(1919年作)一诗中,他强调地球与自己都是“实有性”的,而不相信佛家谓地球“只是个梦幻泡影”,自身“只是个妄执无明”。这实际上是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客观实在性,是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他“不相信那缥缈的天上,还有位什么父亲”。这也是对“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神学目的论的否定。特别是在《女神·凤凰涅槃》一诗的《凤歌》中,集中表述了他的宇宙观。

应当指出,郭沫若在写作《凤凰涅槃》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由于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受过现代严格的自然科学的教育,并初步接触到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因而他对世界总的看法已有不少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而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相接近。如他没有把地球或太阳当作宇宙的中心,而把它看作一个统一的物质世界。他认为宇宙无论“空球”也好,“整块”也好,都是物质存在,而非虚玄的精神存在。虽然他还不能清楚地认识哲学上所说的物质与具体的物质形态的联系和区别,

但他认为宇宙是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外的。又如他对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和有限性已有一些可贵的科学猜测。他的“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的诗句，似乎已悟到宇宙有限与无限的一些秘密。

由以上的例证可以说明，郭沫若早期对于世界的本原，总的来说，是不相信世界是由神秘的精神即神的意志来决定的。他在1922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还谈到形而上学者提出的一个无始无终的本体是“假拟”的，宗教家鼓吹的“全能全智”的上帝是“虚构”的（《文艺论集·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可惜的是，当时他并未能把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到底。他在具体说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时，未能摆脱唯心主义的羁绊。如他在肯定文艺上的浪漫主义时，就曾引用佛家“法由心造”的学说（《印象与表现》）。这就是说，“宇宙的现象”是由人的意识决定的。由于有这样的观点，他对现实不满时曾产生“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的想法。但现实教训了他，使他认识到这终究是一种“不兑换的纸币”。他是从对自然科学的研讨中，来探讨宇宙的奥秘的：

科学对我们说，我们所居住的这个银河系统的宇宙，是有限而无限的；宇宙中一切的质与能，在辗转相变，一格兰母的质化为三亿四千万‘马力时’的功量；宇宙中无数的太阳在发射无量的光能，在凝集成灿烂的螺旋星云而别成一新星系统……。

科学又对我们说，一切生物都是由于原始的单细胞生物进演而成。一切的个体不成为唯一的细胞则为唯一的胎原细胞所分化；细胞的要素是蛋白质、炭水化物、脂肪；构成

这三种要素的原质，不外 N、H、C、O、S、P 等简单的原子。——其实这些原子已非简单，各个原子内容都是一种极复杂的宇宙；介子、质子便是这宇宙中的恒星、行星。

——《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

郭沫若这段话：（一）说明了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天国到人间，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都是统一的物质世界，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统一，物质的无限性是可分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二）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物质离不开运动，而且运动不只是机械运动，还包括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等。这些运动的基本形式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因此，运动已不只是数量的变化，也有质变和飞跃的现象。在各种形式的转化中，能量是守恒的。不过，他在说明“客观的真实”运动时，却不免受柏森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的影响，曾以运动的无条件性、绝对性，否定相对静止的存在，否定事物的稳定性，把事物说成是不可捉摸的东西。又如：他对“为什么这宇宙存在？宇宙的第一原因，假使有时，究竟是甚么”等问题大惑不解，认为“科学不能答应我们。答应我们这种问题的权能，在它的职分之外，也怕是在我们人类智力的范围以外”。这已陷入不可知论了。可见他当时在自然观上，仍然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

在研究郭沫若早期的自然观时，还有必要提到他与泛神论的关系问题。关于泛神论的问题，虽然郭沫若多次谈到他受到哲学上泛神论的影响，有的研究者甚至把泛神论当做郭沫若早期思想的核心，但我的看法则有所不同。在这点上，我很同意周扬所说郭沫若早期泛神主义是“自我表现主义的极致，个性主义之

诗的夸张”，以及“他在一种泛神主义的外衣之下歌颂了自己所要歌颂的一切”的说法（《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也很同意张光年提出的“泛神论在郭沫若的思想中间，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以及“泛神论不过是这位诗人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一种诗意体现”的观点（《论郭沫若早期的诗》）。对这个问题，本书《郭沫若与斯宾诺莎》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论述，兹不赘。

二 认识论

郭沫若早期认识论的观点，集中表现在他关于文艺与社会生活关系问题的论述上。关于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这是一个牵涉到对文艺本质认识的重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本质论产生之前，较流行的有两种说法，即“表现”说和“再现”说。所谓“表现”说是把文艺归结为作家主观意识或心灵的表现。如康德说：“美的艺术是天才的艺术”。费希特说：文艺来源于艺术家的“自我意识”。这种观点的哲学基础无疑是主观唯心主义。所谓“再现”说是主张文艺来源于生活，并再现生活。如福楼拜认为：作家的创作“就如一个人拿了一面镜子从大街上走过一样”，有什么照什么，是什么样子照什么样子。这种观点虽是唯物主义的，但却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

在五四运动前后，郭沫若曾广泛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文论，“表现”说和“再现”说是他自己的文艺论著中经常说到的问题。很明显，郭沫若早期是倾向“表现”说的。他曾认为：人类从孩童时期起就具有表现自己感情的本能，“饥则啼，寒则号”，这“一啼一号都是他自己的心声”。这种本能由声音、语言等形式表现出来，就产生了文艺（《文艺论集·批评与梦》）。他进而指出：文艺是为了表现作者自己心理变化、描写自己的心境的，是“我的表现，是

艺术家的一种内在冲动不得不尔的表现。”(《文艺论集·印象与表现》)他曾引用康德的“文艺是天才的创作”之类的话,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也称许过。特别是对当时兴盛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表现主义,更产生过共感。在作家主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上,他认为“艺术是从内部产生。它的受精是内部与外部的结合,是灵魂与自然的结合”(《文艺论集·印象与表现》)。这与表现主义流派的世界应由“自我”的主观来把握,把自我的个性移入其中,成为“我的世界”,而艺术就是将“我的自我”与“我的世界”溶成一个“超主体的个性”的说法相近。但是,郭沫若早期并非彻底信奉“表现”说。因为:第一,“表现”说否认社会生活是文学的源泉,认为艺术的任务不是模仿,而在于表现“心灵”和“自我”。郭沫若的看法并不完全如此。如他说:“宇宙的事事物物接触我们的感官,在我们的意识上发出一种印象。艺术家把种种的印象,经过一道灵魂的酝酿,自律的综合,这便是表现”。第二,郭沫若对康德的“天才论”、弗洛伊德的“说梦”,并非全盘吸取,而是与他们有较大的认识差别。康德认为艺术来源于作家的灵感,而作家的灵感又来自“先天的智力倾向”。郭沫若则认为“天才不是天生成的”,主要是后天勤奋努力的结果。弗洛伊德把梦说成是“幼时所抑制在意识之下欲望的满足”,郭沫若则认为“梦是人体的末梢感官与脑神经中枢的连络活动”。他对梦的解释始终坚持现实的原则,认为梦是将真实事件加以诗意幻化,它像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那样自然(《文艺论集·批评与梦》)。第三,郭沫若并非完全反对“再现”说。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艺术模仿自然”这句话,“在艺术家的修积上,在艺术的取材上,原是可以成立的。”他说:“我时常觉得艺术家就好像采蜜的蜜蜂,它不问是什么花房的蜜汁,都要去采取,采取万花的蜜汁融会成一种独创的蜜糖,

艺术家的作品就像这样。”(《印象与表现》)第四,郭沫若根据不同文体的文艺作品反映现实的特点,认为“表现”说和“再现”说这两种极端矛盾的主张,而同时又各含至理”。他说:“没我的精神、客观的摹仿说,在文艺上我们也不能一概抹杀。譬如画家、小说家除掉客观的模仿便不能有所成就。大凡静的艺术或者空间的艺术(绘画、雕刻、建筑)不能不偏重客观,摹仿说的理论在这一方面实际上才可成立。”而诗歌是“偏重主观”的,应持“表现”说(《文艺论集·文学的本质》)。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郭沫若早期对文艺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认识,既不是彻底的“表现”派,也不是彻底的“再现”派,而是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定。这反映了他当时“在唯物与唯心之间摇摆”的情况,也表现了他对文艺本质的探索。他似乎已模糊感觉到作品的素材离不开社会生活,并认识到作家反映现实不是照相机式的摄取或镜子式的反射,而是复杂的精神劳动。但他对文艺于生活的依赖和反映关系有所忽视,对文艺的目的性有所轻视。而且,在世界本原的看法上,有时还接受过佛家的“法由心造,心外无一法”的思想影响。尽管他偏重“表现”说是看到“再现”说有轻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弊端,有意要纠正这种偏向。这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他终究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因而未能把从社会生活到作家再到文学作品这三者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研究。特别是未能充分认识到人的社会实践对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夸大了文艺创作过程中心理活动的作用,并有把作家的心理状态只看作人的本能的倾向。因而,他没有科学地揭示文学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统一,是表现与再现的有机结合。但郭沫若早期在对文学本质探索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包含着文学是表现与再现有机结合的思想萌芽的。这或许是

他后来文学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起点。

三 辩证法思想

人们曾谈到郭沫若的早期诗集《女神》充满着“动”的精神。这种“动”的精神亦即事物的变化发展的精神。这在郭沫若的早期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郭沫若看来，世界上没有静止和不动的东西，一切都在永恒不断地变化着，世界就是一幅永不停息地变化、发展的图画：

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这就是说，旧的东西在不断的死亡，新的东西在不断的产生。这是以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所得出的朴素的辩证法的结论。它不同于那种只承认变化而看不出进化、发展的循环论。

万物为什么运动？郭沫若已悟到了它的根源，那就是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如贫富、贵贱、美恶、贤愚、光明与黑暗、创造与破坏等。事物的变化是由于对立面的冲突和斗争引起的。郭沫若重视斗争，他认为要以新社会代替旧社会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光明之前有浑沌，创造之前有破坏，新的酒不能盛容于旧的革囊。凤凰要再生，要先把尸骸火葬。我们的事业，在目下浑沌之中，要先从破坏做起。

——《我们的文学新运动》

这充分表现了他的革命精神。只是他当时还不大了解辩证的否定,未能认识到否定不仅是事物发展的环节,同时也是事物联系的环节。新事物固然和旧事物有着本质的差别,但二者又有着必然的联系。新事物并非简单地抛弃旧事物,而是对旧事物有所扬弃。因此,创造与破坏不能有先后之分,新社会与旧社会也不好断然割裂。

郭沫若早期为什么会具有辩证法思想呢?这主要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有力地冲击了旧的形而上学的观念,直接影响了郭沫若。但从哲学思想的发展来说,又有着学术师承的渊源。达尔文的进化论,无疑是其思想来源之一,而我国古代的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也给他以深刻的影响。

在我国哲学史上,辩证法有两大系统:一个是老子,一个是《易传》。老子尚柔,主静,贵无;《易传》则尚刚,主动,贵有。这两大派在我国哲学发展史上都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儒家经典《易传》,适应宗法制封建社会的需要,影响更大。

在五卅时期,郭沫若主要吸取的是《易传》的辩证法思想。郭沫若在事物的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中,强调的是刚强的一面起决定作用。他对《易传》中那种以自强不息为特点的辩证法思想很欣赏。如他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他所推崇的孔子的人生哲学。以“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作为本体进化之必然性(《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显然,这反映了当时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需要。他的《女神》正具有一种刚健进取的精神。诗人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古代铭词作为“自我完成之标语”,呼唤着人们“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但是,他的思想又与《易传》有很大的不同。《易传》的辩证思想虽强调矛盾在事物对立面转化中的作用,

但它企图把弱者和强者固定在各自所处的地位上,使二者不再斗争而彼此配合,以“保合太和”,从而使刚上柔下的封建等级制度恒久地运转下去。而郭沫若则强调变革是为了使一方消灭另一方,“自行创造个新生的太阳”,使新社会代替旧社会、新中国代替旧中国。

总之,郭沫若早期强调自强不息,主张积极主动以促进事物向着有利方面发展的思想,与《易传》接近,而和老子的玄览、静观思想异趣。

郭沫若早期虽已具有辩证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并不彻底。在观察现实时,有时他又陷入了相对主义。如他在《孤竹君之二子》的幕前序话中,曾以他的生物变化和大冶造器、造化生人的观点,来为他的历史剧作理论根据。我们从这理论本身,可看到他的形而上学观点。他承认事物的形变、量变,却否认其突变、质变。他看到新旧古今的“辗转搏拟”,却模糊了它们之间质的区别。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片面地夸大了事物性质的相对性,抹煞其确定的规定性,取消事物之间的界限,从而根本否定事物的客观存在。由此,他夸大人们认识的相对性,否定客观的是非标准。郭沫若这种相对主义观点的形成,或许与我国古代的庄子有某些因缘吧!

四 社会历史观

在对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问题上,郭沫若早期明显受到人本主义和卢梭的关于社会不平等起源的思想的影响。先说人本主义对他的影响。

郭沫若早期曾创作《卓文君》、《王昭君》和《聂婪》三个剧本,总题名《三个叛逆的女性》。对于这几个剧本的反封建礼教、主张